



徐霞客游記

徐霞客游記

[明] 徐弘祖 著

徐弘祖字霞客，是明代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所著《徐霞客游记》既是重要的地学著作，也是一部文笔瑰丽的游记佳作。徐霞客用日记体生动记述了三十多年中对祖国名山大川，特别是西南地区实地考察的心得，涉及地貌、水文、地质、植物等。

模范山水 千古奇书

国学经典



原味呈现



前 言

周宁霞

—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这一百年来，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纺织、冶炼、医药等等都有迅速的发展。“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一系列科学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纷纷以璀璨的异采呈现在人们眼前。《徐霞客游记》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广泛系统地探索和记载岩溶地貌的地理学巨著，也为这一时期的科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7），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这五十多年，正是明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在强大的农民起义打击下，由没落走向崩溃的前夕。徐霞客的家乡江阴，是当时对内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商业、手工业尤其发达。生产的发展要求思想的解放，重试验、重考察的科学精神，开始兴起。先进的人们纷纷从各自不同的方面，探索着物质世界的奥秘。生活年代稍早于徐霞客的李时珍（1518—1593），总结自己入山采药、订正品物名实的感受道：人可以“窥天地之奥秘而达造化之权”（《本草纲目》卷一），表现了他“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观点。稍晚的王夫之（1619—1692）更比较明确地阐述了物质不灭的思想：“车

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盒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有形者且然，况其絪縕不可象者乎。”（《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化。

在政治思想领域，代表劳动人民或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反映了手工业、商业发展要求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和社会结构，发起了一再的冲击。针对当时窒息着学术界，只事空谈、不务实学的程朱理学，先进的人们提出了重现实、明是非、经世致用的主张。统治集团对于这些动摇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支柱的新思潮采取了一系列残酷镇压的手段。同时，为了在思想上加强禁锢，明王朝还规定，凡士子只准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及当代浩律典制一类的书，“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在明代，进士入仕之易是十分突出的。乡试中式得举人，经过会试、殿试成进士，就可以被推荐担任中央和地方各种官职。皓首穷经、以科举仕第为荣，已成为士大夫中恶浊的社会风气。面对时代提出的尖锐课题，是沉沦于科举八股，甘当“地廪”。“国蠹”式的士子呢，还是突破禁锢、摒弃利禄，在实践中探索科学的真理？徐霞客选择了后者。

徐霞客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他也曾顺应时俗，“俯就铅槧”，但在应试失败之后，就决心挣脱科举的枷锁，埋头于他真正感兴趣的古今史籍、舆地图经之中，向往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在广泛阅读、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他不顾异端邪说之讥，毅然对图经志籍提出了怀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徐霞客墓志铭》）特别是对滔滔入海的大江（长江）的观察，使得徐霞客对自古以来奉为经典的《禹贡》中的“岷山导

江”说发出了责难：“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溯江纪源》一名《江源考》）为了考察祖国的山河大地，他自二十二岁开始出游，三十多年间，徐霞客东渡普陀，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巔，西南远达云贵边陲，足迹及于当时十四省，即现在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十六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直到五十五岁那年身患重病，才被云南丽江守派人护送，经湖广黄冈返回家乡，第二年就去世了。说徐霞客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旅行考察事业，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和古今中外不少著名人物一样，家庭的影响，对于成就徐霞客的事业，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徐霞客祖上作为宋朝的官吏（开封尹徐铉），北宋末年随宋王朝南迁，“子孙俱誓不仕元”。他的高祖曾做过明朝的官吏，他父亲却隐迹田园，“不喜冠带交”。徐霞客从小就“仰慕一切冲举高蹈之迹，于一切裘马少年之习，秉心耻之”，和这种重视名节、操守的家风的熏陶，颇有关系。特别是他的母亲，对于徐霞客“问奇于名山大川”的志趣，更给予有力的支持。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她亲手为霞客制“远游冠”，以壮行色；每次霞客出游归来，“为言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蹬之所见闻，有令人舌挢汗骇者，母意反大愜。”（《徐霞客墓志铭》）为了打消霞客出游的顾虑，她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还豪兴满怀，和徐霞客一起游了荆溪、勾曲。这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也算得一件壮举了。时代的召唤，家庭的支持。加上他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实践精神，徐霞客终于开辟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观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

十卷《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详尽地记录了徐霞客毕生大部分行履所至、观察所得。除散失者外，目前保存下来的达六十余万字（此外尚有部分朋友间赠答的诗文、传志、石刻等）。第一卷十七篇游记反映了徐霞客五十一岁前的主要游踪。这一时期，他游了太湖的东西洞庭山、

泰山、落迦山(以上均无游记)、天台山、雁宕山、白岳、黄山、武彝山、庐山、九鲤湖、嵩山、太华山、太和山、荆溪张公、善卷二洞(无游记)、罗浮山(无游记)、盘山(无游记)、五台山和恒山。全国主要名山,除四川峨眉山、湖广衡山、云南鸡足山外,他已遨游殆遍,积累了观察山川地貌的丰富经验。自五十一岁起,徐霞客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开始了西南之行。这次旅行历时四年,是徐霞客一生中外出时间最长、行程最远、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旅程,行经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到云南。《游记》第二卷至第十卷,生动翔实地记述了徐霞客长途西行中“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三次遇盗,四次绝粮,惊世骇俗的野外考察生活。《游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自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的考察,到岩石、洞壑、瀑布、温泉的搜奇剔胜;从动物、植物生态品种的比较,到矿产、手工业、居民点、物价的记录;从民情风俗的观察,到民族关系、边陲防务的关注……范围之广,鲜明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的人们注重实际,迫切需要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

《游记》所保存的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广泛、深入的考察记述,尤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我国西南各省,石灰岩分布面积很广,是世界最广大的石灰岩地貌区域之一。徐霞客行程经过的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带,正是典型的石灰岩地貌区域。徐霞客对沿途见到的石灰岩地貌的种种特征,如“铮铮骨立”的石山,“攒出碧莲玉笋世界”的峰林,如“坠壑成井,小者为智井,大者为盘洼”的圆洼地,如“漩渦成潭,如釜之仰”的落水洞,以及“伏流潜通”、“水皆从地中透去”的伏流现象,无一不作具体细致的考察记述。对于形形色色的石灰岩洞穴,徐霞客不仅描述其瑰丽雄奇的景观,而且分析其成因,考察其方位,研究其结构,其目测步量和记述的准确性,和现代测量的数据十分接近。比起1781年奥地利地理学家格鲁柏(Th. Gruber)对今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地貌(即岩溶地貌(进行考察和研究来,徐霞客远远走在了

前面。《徐霞客游记》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的科学文献。

《游记》本文至崇祯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止，其时徐霞客在云南鸡足山。关于徐霞客西行所至，他的朋友陈函辉、钱谦益、亲戚吴国华在霞客的志、传、铭中说他曾到过四川峨眉山，并西出石门关、穷星宿海，还到过西藏，“赴西番参大宝法王”。但从《游记》本文看，这些说法都不确实。徐霞客在长途西行前既未到过四川峨眉山，西行途中他由湘入粤，经黔入滇，最远到达腾越州一带，不曾迂道游峨眉。季梦良在《游记》最末一天日记之后注道：“王忠纫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俱无小纪。’余按公奉木丽江之命，在鸡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则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徐霞客于崇祯十三年六月返抵家乡。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述霞客回家前最后这段生活道：“霞客游轨既毕，还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于行。留修鸡足山志，三月而志成。丽江木守为笻舆从送归。转侧笻舆者一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江口，遂得生还。”时间和季注完全吻合。则徐霞客游踪西至腾越州，然后返至鸡足山而止，是很清楚的。陈铭曾说霞客对游记稿“自怡笥篋，雅不欲以示人”，他们之所以弄出错误，很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游记》原稿所致。

二

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选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徐霞客为探讨客观真理，百折不挠，三十余年如一日地献身旅行考察事业的科学实践，正是《游记》最感人的精神力量所在。今天，特别在经历了种种现代迷信的祸害之后，徐霞客那种敢

于对任何本本提出质疑的科学勇气，他一往无前的实践精神，尤其闪耀出熠熠光华。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徐霞客对野外考察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困顿，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和蓬勃的乐观精神。湘江遇盗，他行囊被洗劫一空，一时又借贷无门。面对漫长的旅程和不如归去的劝说（“询余如归故乡，为别措以备行囊”），徐霞客的回答是：“不欲变余去志”，“吾荷一锄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旅途断炊，徐霞客或者“以刘君所惠绸一方，就村妇易米数筒”（崇祯十年四月十四日），或则“以褶、袜、裙三事悬于寓外，冀售其一，以为行资”。好不容易得了二百余文，他“亟索饭，乘晚探尖峰之洞”（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为搜剔山川岩壑的奥秘，徐霞客爬山，他望险而趋，必登群峰之巅；探洞，他觅奥而逐，务达幽穴之邃。不论传说中的“神龙精怪”（茶陵麻叶洞），还是活生生的巨蟒（融县真仙岩），都挡不住他前进的脚步。有时走错了路，他“幸兼收之胜，岂惮往复之烦”！有时蹬断路绝，同行的伴侣和向导都已裹足却步，他还贾勇直前，“衣碍则解衣，杖碍则弃杖”，“穿棘则身如蜂蝶，缘崖则影共猿鼯”。在雁宕山，他冒着几乎葬身深壑的危险，几次攀登雁宕顶峰，终于勘明大龙湫瀑布的源头和雁湖的确切位置，证实雁湖之水“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而志书所谓“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纯属以讹传讹。在楚南，为追寻三分石，查勘潇水之源，徐霞客露宿九疑山头。“山高无水，有火难炊”，他在篝火边、风雨中度过了饥饿寒冷的夜晚，可是，当他透过拂晓的晨雾。“仰见三分石，露影指顾间”，他又立即“忍饥冲湿箬而南”。终于，徐霞客找到了“五涧纵横，交会一处”的三分石分水岭，弄清楚三分石是潇水、岵水、沅水的分水处，三水均下注湘江，指出当时人们所谓三分石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的错误（崇祯十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

艰苦卓绝的实践，结出丰硕的科学之果。徐霞客经过长期、广泛、

深入的实地踏勘，终于证明了“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他的著名论文《溯江纪源》，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论证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被认为不可动摇的《禹贡》“岷山导江”说的“定论”。他写道：“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事实上，自西汉以降，人们早已知道长江上游有金沙江。《汉书·地理志》越巂郡遂久县（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就有“滎水（即金沙江）出徼外，东至犍道（今四川宜宾）入江”的记载。但由于被奉为经典的《禹贡》的“岷山导江”说，人们总是把岷江当作长江正源。徐霞客以他的实践和无畏的科学勇气，推翻了一千多年来陈陈相因的旧说，这不仅是当时重要的地理发现，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此外，徐霞客还辨证了盘江、左、右江、龙川江、麓川江、大盈江、澜沧江、潞江、元江、枯柯河等水道的源流。由于当时条件和他行踪的限制，徐霞客于北盘江上流及南盘江下游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他指出元江、澜沧江和潞江均独流入海；澜沧未尝东入元江；潞江亦非澜沧支流；枯柯河是潞江支流而与澜沧无关。这些，都纠正了《明统志》有关记载的混乱和错误。

纵观《游记》，我们还鲜明地看到，不论徐霞客是否十分自觉，他在野外考察的大部分情况下，正是遵循着一条严格的、科学的认识路线。他不满足于表象的观察，也不为某些虚幻、不可知的现象所迷惑，而是客观、深入地观察自在之物，从探究事物本身的联系中得出结论。这正是他能透过现象、较深入地认识自然，获得丰硕科学成果的重要原因。在潯州白石山，对于《西事珥》和《百粤风土记》所载“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的“漱玉泉”，他经过实地观察和向老僧调查了解，判断道：“余谓

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所谓“闻钟泉沸之说”，“洵皆好事之言也”，澄清了两书中虚幻的臆说。在鸡足山，徐霞客看到大觉寺的喷泉，根据自己对水流的深刻了解，正确地判断附近一定有一股和喷泉高度相应的水源，准确地阐明了地下水压力的原理。对腾冲附近的火山遗迹、硫磺矿等不常见的景观，徐霞客所作的记述和分析，也都符合现代科学的解释。

徐霞客之善于观察，还在于他在客观地观察自然的基础上，善于从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以及相互联系中去把握特征、探究规律。崇祯元年，徐霞客游福建时先后行经建溪和宁洋溪，身历黯淡、石嘴、溜水、石壁等险滩，对溪流形势作了细致的观察比较，他联系两溪的源头和流程，作出了河流的流速与河床比降成正比的科学分析：“宁洋之溪，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闽游日记》）他又由石崖“水啮成矶”（湖广茶陵）、“江流自南冲涌而来，狮石首扼其锐，迎流剜骨，遂成狰狞之状”（粤西新宁），看到水力对于岩石的作用，进而认识到河流在凹岸侵蚀较强的原理：“江流击山，山削成壁，流回沙转，云根迸出”（崇祯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从植物和环境的关系，观察到地形、气温、风速对于植物生态种属的影响，得出了“山谷川原，候同气异”（《游太和山日记》）的科学结论。

这样一条科学的、辩证的认识路线，尤其典型地表现在徐霞客对岩溶地貌的考察上。对于石钟乳的岩溶现象，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早已有所注意。春秋时期记载耕作制度的《计倪子》和秦汉时的《神农本草经》，均有著录。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并指出石钟乳是沉淀作用生成的。但这样多方面地、系统地考察探讨岩溶现象，徐霞客则是第一个。在徐霞客早期的旅行中，已经对石钟乳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比较。其后经过长期、大量的观察，他明确地指出了石钟乳的成因：“崖间有悬

千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云南永昌水帘洞）在岩溶地区的长途考察，使徐霞客深刻体会到“水”在形成这种特殊地貌中的重要作用。他记述岩溶漏斗洼地、伏流等现象道：

“岭头多漩涡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深或不见底……始知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窍，辄水捣成井”（楚南秦人洞）；“透穴……皆平地下陷，或长如峡，或圆如井……下则渊水澄澈，盖其地中二三丈以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焉”（粤西潯州）。他不仅道出岩溶地貌的特征和成因，并就落水洞的大小和漏斗洼地的特点，厘订了“智井”、“盘洼”等等名称（滇南罗平）。在大范围的游历考察中，徐霞客经过反复的观察比较，还注意到岩溶地貌由于发育不同而形成的地区差异。他精到地勾勒出不同地区的特点，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崇祯十年六月间，在从柳江上航融县途中，他写道：“自柳州府西北，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邐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所异于阳朔、桂林者，彼则四顾皆石峰，无一土山相杂，此则如锥处囊中，犹觉有脱颖之异耳。”鲜明地道出了已处于岩溶老年期的柳江峰丛谷地“两岸山土石间出”的特点，以及它和漓江峰林洼地“四顾皆石峰”的差异。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自南宁北上三里城，经过宾州公村，他将这一带地貌和半个月前自隆安东返南宁途中所见作比较，写道：

“自隆安西岭入（南宁），土山崇卑不一，皆纯土而不见石，至此（指公村附近）始复见峥嵘面目矣。”明确地勾勒出桂西北峰丛洼地的南界是宾州公村，而桂西南峰丛洼地的东北界是隆安。后来他横越贵州，在云南东部考察南盘江源流之后，又对桂、黔、滇三省地貌作出概括比较：“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介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介于二者之间。”

（崇禎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这些记述比较，和现代地质学对西南一带岩溶地貌的考察分类，完全符合。

石灰岩溶洞的大量存在，是石灰岩地貌的突出特征。为探明它们的特点、结构，徐霞客曾身历足涉的岩洞达三百多个。足迹所至，他无不想方设法穷其奥、尽其胜。这样登堂入室细细搜剔，大自然也向他展示了自己最美好的奥秘。他发现这些岩洞有的雄邃宏丽，有的杳窅幽阒，有的层楼复阁、重门若剌，有的曲折窈窕、宛转透漏。有的是良好的天然仓库，“可置谷数千钟”（向武百感岩）；有的有丰富的地下水源。“碧黛中汇，源泉不竭”（三里韦龟岩）。他发现岩溶地区有许多山里面是空的：“此村水坠穴，山透腹，亦与向武一辙也。”（三里韦龟村）他指出它们都由水冲击“磨砺”而成：“水大时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而出此，激涌势壮，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三里佛子岭南岩）在西方，洞穴学是一门才兴起不久的学科，专门研究天然洞穴的形成、结构，探讨对它们的利用。徐霞客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对岩洞作如此广泛深入的踏勘，留下大量精确的记载，是十分可贵的。

然而，尽管在考察自然现象的多数情况下能够遵循科学的认识路线，徐霞客思想上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唯心色彩。对于他所不能掌握的“命运”，他只有仰仗“神权”来裁决；对于凡是超越他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现象，他就只能用“神力”来解释。如湘江遇盗后选择哪一条路线前进的问题，如能否携带静闻遗骨入滇的问题，霞客都曾经求神问卜，征求“神”的“意见”。一次他爬山时忽然双脚肿痛，不良于行，他就以为这是他以“灵泉”濯足、“山灵罪我”的结果，于是“以佛氏忏法解之”。——徐霞客思想上也曾受到佛教的影响。他每到寺院，往往先去“礼佛”；他有时以佛教语言引入《游记》，相信“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他选择鸡足山作为西行的终点，并为之修志，都表明了这一点。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

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自然辩证法》)十八、十九世纪的不少自然科学家是这样(即现代又何尝不是这样),那在徐霞客生活的当时就更不足为奇了。《游记》中的不少记述反映了这一点,正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的徐霞客,显示了《游记》记述的真实性。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克服千难万险、从事长途旅行,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颇不乏人。但他们或者是奉命出使,宣扬王朝的“天威”,像张骞、郑和,或者是为了宗教的目的取经求法,如法显、玄奘。而不出于任何政治的、宗教的企图,没有政府的资助,纯粹以考察自然为目的,毕生从事旅行事业的,徐霞客为亘古第一人。在我国史籍中,地理学著述也颇为丰富。但侧重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记述的居多,而对地貌作系统考察,对岩石、水文、植物、气候等作多方面观察记述,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的,徐霞客也是第一个,这是他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杰出之处,也是《游记》突出的科学价值所在。

三

《游记》既是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文学游记。这方面,人们历来给以很高的评价。钱谦益称它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嘱仲昭刻〈游记〉书》),奚又溥则说徐霞客“其笔意似乎厚,其叙事类龙门”(奚序)。我国文学游记有丰富的佳制名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被誉为山水长卷;范成大的《石湖居士驴鸾录》和陆游的《入蜀记》也都以日记体描述他们旅行途中所见的如画江山。然而论旅游之专、行程之长、篇幅之巨和内容之丰富多采,《游记》则是无与伦比的。当我们随着徐霞客的足迹,越过千山万水,遍历奇峰异窟,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

雄奇瑰丽的万里山河，宛如一幅幅色采斑斓的山水长卷的长篇巨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游记》作为徐霞客探索山川地貌奥秘的忠实记录，和它所描述的大自然一样质朴而绮丽、生动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徐霞客这样勾勒石树交映的恒山箭箐岭：“东西峰连壁隤，翠蜚丹流。其盘空环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树；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树之色不一也，而错综又成合锦。石得树而嵯峨倾嵌者，幕以藻绘而愈奇，树得石而平铺倒蟠者，缘以突兀而尤古。”——无须再置一词，已是一幅雄浑天成的山石小品。他记九疑山径所见：“峰尽千羽之遗，石俱率舞之兽”；写他跋涉在群山万壑之中：“升降宛转，如在乱云叠浪中”（道州华岩），“穿瑶房而披锦幃，转一隙复攒一峒，透一窍更露一奇，至狮、象、龙、蛇夹路而起，与人争道……”（九疑山）；他记岩洞：“……入第七门，如连环贯珠，络绎层分，宛转俱透；升降于层楼复阁之间，浅深随意，叠层凭空。此真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也。”（阳朔珠明洞）险峰、峻石在霞客眼里，不是透剔如洗，便是栩栩如生，尽管猛如“狮”、“象”、“龙”、“蛇”，却亲切地“与人争道”；杳冥的岩洞随着霞客笔触的层层深入，显出了它“宛转俱透”的灵境。这样的“瑶房”、“锦幃”和连环贯珠般的“蕊珠宫”，哪得不令人心驰神往！

创作源于生活，也是作者对生活的态度的体现。大自然雨、雾、晴、晦的千姿百态，山、水、树、岩的万般安排，再现在徐霞客笔端，处处融汇着他祖国山河大地的无限深情。试看他记云南浪穹普陀崆山峡的急流：“江流捣崆中愈骤，崆中石耸突而激湍，或为横槛以扼之，或为夹门以束之，或为齟齬，或为剑戟，或为犀象，或为鸷鸟，百态以极其搏截之势，而水终不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过之，或挟而激之，百状以尽超越之观。”他记漓江夜航：“萤阵烛山，远近交映。以至微而成极异，合众小而现大观，余不意山之能自绘，更无物不能绘也！”他写雾中下武功

山：“隕北而下，如门如阙，如幢如楼，直坠壑底……然雾犹时时笼罩，及身至其侧，雾复倏开，若先之笼，故为掩袖之避，而后之开，又巧为献笑之迎者。”这里霞客不仅把水石激扬的态势、萤阵雾幕的情趣写活了，而且人格化、性格化了。一枝彩笔，拟物拟人，挥洒自如，是画，是诗，也是对大好河山激情的颂歌。不是对所记述的对象观察得深入精到，又怀有热烈深切的感情，是不能出此的。

霞客记游的又一特色，是真。不假矫饰，不事雕琢，已经成为《游记》的独特风格。这一点，在《游记》的原始钞本季会明钞本中反映得尤为清楚。唯其不假矫饰，它秉笔直书，以大量质朴的记述保存了一系列科学的、历史的资料；唯其不事雕琢，它真实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徐霞客的精神风貌。《游记》尽管不像《永州八记》那样贯穿着作者的感怀，然而霞客对奸宦的憎恶，对摩崖碑刻等文化遗产的珍爱，他忧时伤国的感情，仍时时凸现在字里行间，宛然在目。

和霞客一生旅行考察的规模相适应，《游记》气势之雄放也是突出的。它东自天台雁宕，西南迄于云贵边陲，轩腾起伏，尺幅千里，远非一般记游之作所能企及。

四

《游记》在徐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书。据最近发现的季梦良序，霞客病中曾将《游记》托付给他。霞客去世后，《游记》先由王忠纫手校，略为叙次，继由季梦良“遍搜遗帙，补忠纫之所未补，因地分集，录成一编”，于壬午年（1642）腊月整理完竣，但其间已有残缺。乙酉年（1645）徐霞客家乡被清兵攻破，《游记》也经历了一场浩劫，至季梦良再次整理时又缺《滇游》首册。其间又经辗转传钞，以致“文残简错，句乱字讹”。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寄（字介立，霞客庶子，因育于李氏，长于明清

间,故名。)据曹骏甫、史夏隆钞本整理,补入《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和《盘江考》诸文,是为李介立本。乾隆年间,陈泓据当时多种钞本互核,判断李本“为诸本之祖”,撰写了《诸本异同考略》(又名《游记诸本编次略》),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游记》版本情况的珍贵资料。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霞客族孙徐镇(字筠峪)根据杨名时、陈泓的校本校订刊刻(以下称乾隆本),《游记》这才正式出版,上距徐霞客去世,已经一百三十五年了。嘉庆十三年(1808),叶廷甲以徐版再次和杨名时、陈泓校本雒勘梓行,并将霞客友朋间赠答的诗文辑为补编;1928年,丁文江又主持编绘了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并编入霞客的家祠丛刻(即《晴山堂帖》),连同据叶本标点的《游记》本文,和所著《徐霞客先生年谱》一起印行。其他如集成图书公司印本、扫叶山房印本、《万有文库》本及《国学基本丛书》本等等多种印本,《游记》本文或依乾隆本,或依叶本,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此次标点整理,由于得到了两个较早的钞本——季会明钞本和徐建极钞本,从而使《游记》的面貌焕然一新:《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和《粤西游日记》以季会明本为底本(按乾隆本分卷,并补入乾隆本有而季本缺的内容),卷一名山游记和《黔游日记》、《滇游日记》以乾隆本为底本,与徐建极本比对雒校,补入被删削的内容。上述补入部分,均或出校记或以符号标明(详见《校点说明》)。附编则收入全部有关诗文和家祠丛刻,包括新发现的徐霞客《赠鸡足山僧妙行七律二首》。这样,就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恢复了《游记》的本来面貌。

季会明钞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共五册,题作《徐霞客西游记》。所收日记起自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迄于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即霞客西南游程中浙游、江右游、楚游和粤西游部分。全书不分卷,每册卷首列有游程提纲。各册钤有“虞山毛晋”、“汲古后人”、“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号省斲影山草堂收藏金石图书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等印章,与

《嘉业堂钞本书目》中所录“徐霞客游记，不分卷……旧钞本五册，东吴毛氏、莫即亭藏”相符。卷首季梦良的序，说明了徐霞客病中将《游记》原稿托付给他，他和王忠纫整理、编次的经过。经和乾隆本对校，季钞本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钞本所存日记除季梦良注明散失者外，基本上每日有记，和乾隆本多处出现的综合记叙截然不同。如崇祯十年二月初二至初六日，十一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钞本均每日有记，少则十来字，多则百余字，乾隆本却分别归纳为“初二至初六日俱雨阻庵中”和“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日日坐雨寺中”。

二、钞本于霞客行程多有详细记述，乾隆本则多数删削合并。崇祯十年七月初九日霞客自融县返柳州，记江行所见，描述雨势、水势共二百余字，乾隆本归纳为“……共六十里，泊沙弓”，不足五十字；崇祯十一年正月十七日，霞客记述自草塘至庆远府南门一路行程达三百多字，乾隆本只“北三十里，抵庆远府之南门”一句。

三、钞本于霞客旅途生活的记述，比之乾隆本远为详细、具体，叙事曲折有致。如湘江遇盗，如同行的静闻在南宁病故后霞客为之“起窆”、捡骨的经过等，钞本均有详尽记述，乾隆本则大事删削，改写失真。崇祯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霞客为静闻起窆事在南宁稽留整整六天，十八日因雨阻、无夫没有成行，至十九日重新上路。乾隆本删去十二日至十八日日记，十九日仅以“乃行，以积日雨阻，今始得夫也”数字交待前七天在南宁逗留的因由；又如崇祯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间，钞本存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九月九日三天日记。八月二十三日日记之后，季梦良注道：“自此至九月初八日记俱缺。霞客自标简端云‘在杂剌包根内’。遍搜遗帙，并无杂剌。计其时俱在南宁。嗟嗟！南宁一郡之名胜，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随断简销沈。缮写至此，安得起九原而问之！”九月九日记之后，季梦良又注道：“是纪一则，于乱帙中偶得之，……观独

登罗秀诗，知为重阳日记，录之以志此日之游踪，不与前后俱没……。”乾隆本则将这三天日记尽数删去，将季梦良两则注文改写为：“以下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凡游南宁者皆缺。”乾隆本这些重大的删削失真，既大大削弱了徐霞客的精神风貌，也掩盖、抹煞了季梦良忠于所托，尽心竭力编纂《游记》手稿的实践。总计自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季钞本共存游记五百零七天，比乾隆本多一百五十六天，字数多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情况说明，季钞本毋庸置疑地是《游记》的原始钞本，乾隆本已被后来的整理者（很可能是李寄）作过删削改动。而这一点，在季钞本发现之前是从未被怀疑过的。不过，季钞本也还不是一个最完善的钞本。一是由于它的残缺，二是不少地方抄得粗陋，时有脱漏或省略，错字也不少；看来系请人匆忙抄存，未经校勘。然而，它毕竟为我们展示了《游记》的本来面貌。它所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不论是霞客对山川源流的考察，还是对岩溶地貌的记述，乃至对明末西南地区经济生活、社会情况的记载，特别是关于霞客思想、精神面貌的反映，都远较乾隆本丰富、翔实，为我们研究徐霞客和他的《游记》提供了崭新的第一手材料。

徐建极钞本（下简称徐本）原为已故史学家邓之诚所收藏（现在谭其骧先生处）。钞本共六册，起自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迄于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署“江上徐弘祖霞客甫著，孙建极录”。这个钞本也不分卷，于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八月初七日、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年五月初一日等日记前列有游程提纲，体例和季钞本完全一致。两个本子虽内容衔接，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互见而内容详略各异（季本简，徐本详），钞本用纸亦不一样，显然不是一个本子。和乾隆本对校，徐本除侯夫、晨炊等个别生活琐事记述稍详外，主要内容可补正的不多，价值不如季钞本。徐建极是霞客之孙，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徐本缺滇游首册和《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